

中东国家政党政治

叙利亚复兴党的演变及其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赵娜 马帅

摘要：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现代叙利亚演变进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自20世纪40年代成立以来，该党经历了合并、分裂、重组、内斗和换代等一系列演变过程。60年代，党内老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力下降，以“军事委员会”为首的少壮派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获取了地方主义者支持并重建思想体系。少壮派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后，随着其个人权威的上升，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作用和地位相应地下降。在叙利亚内战中，复兴党演变过程中的遗留问题进一步被放大，如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未能与时俱进，军人管党、党内精英阶层分化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任重道远，复兴党亟需加强政党建设，重新握紧国家治理大权。

关键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阿萨德家族；叙利亚内战

作者简介：赵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69）；马帅，长江师范学院助教（重庆4081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8)06-0031-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教育部2017-2018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自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反对派和宗教极端组织试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及其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各方之间围绕阿萨德政权去留问题展开激烈博弈。2015 年 9 月底,巴沙尔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军依靠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得以重新控制国内大部分领土,但恢复叙利亚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叙利亚亟待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稳定”^①。国内外学界对叙利亚内战的分析,大多侧重于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叙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极端组织及国内安全等问题,^②较少关注复兴党在叙内战中的表现及其作用。作为二战后少数民族在黎凡特地区^③建立的政权,阿萨德家族领导复兴党在叙利亚执政近半个世纪,复兴党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逐渐退居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的个人威权之下。如今,巴沙尔总统被诟病不具备其父阿萨德的个人威权,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能否在未来叙利亚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关注。

一、叙利亚复兴党的产生与分裂

复兴党的前身是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于叙利亚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阿拉伯复兴党(Arab Ba'ath Party)。阿拉伯复兴党的创始人米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k)和萨拉赫·比塔尔(Salah al-Bitar)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④但同样拥有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理想,并开始以“阿拉伯复兴运动”(Arab Ba'ath Movement)的名义进行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活动。1947 年 4 月 4 日至 6 日,阿弗拉克和比塔尔领导的阿拉伯复兴党与叙利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扎基·阿尔苏兹(Zaki al-Arsuzi)创建的阿拉伯复兴党(Arab Ba'ath)合并,在大马士革联合召开第一届民族代表大会^⑤,大会

① 岳世平:《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载《理论探索》2006 年第 5 期,第 140 页。

② 国外代表性著作主要有:John McHugo, *Syria: A Recent History*, London: Saqi Books, 2015; Nikolau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ath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Martin Beck, Dietrich Jung and Peter Seeberg, eds., *The Levant in Turmoil: Syria, Palest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国内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韩志斌、闫伟:《从国家构建缺陷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其前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 10 期,第 66-73 页;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6 期,第 6-24 页;方金英:《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6 期,第 18-24 页。

③ “黎凡特”(Levant)一词源于意大利语 Levante,原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凡特是处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地区总称,即地中海东岸大叙利亚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土耳其哈塔伊省的部分地区。

④ 阿弗拉克是希腊东正教教徒,比塔尔是逊尼派穆斯林。

⑤ 尽管两个组织拥有几乎一致的观点且合并为一个政党,但阿尔苏兹并没有参加此次创始会议,也没有获得党员资格。

选举阿弗拉克为党主席,比塔尔为党总书记,阿拉伯复兴党正式宣告成立。

阿拉伯复兴党是第一个明确以泛阿拉伯主义为主要宗旨的政党,具有跨国性特征。其党章指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文化整体。任何在它的子孙中存在的宗教、教派、部落、种族、地区等差异都是偶然的、不重要的,这些差异会随着阿拉伯意识的觉醒而消失”^①。阿拉伯语“*Ba'th*”有重生、复兴之意,取名阿拉伯复兴党意在挽救阿拉伯世界的衰退状态、振兴阿拉伯民族,该党的宗旨为“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②

阿拉伯复兴党的成员构成广泛,其主要支持者是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和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吸收了大量逊尼派穆斯林主体外的少数民族群,并在叙利亚北部阿拉维派和南部德鲁兹人聚居地区设有分支。每个分支组织结构严密,分别设有代表大会、地方指挥部和秘书处。1952年,复兴党与阿克拉姆·胡拉尼(Akram al-Haurani)创建的阿拉伯社会党(Arab Socialist Party)^③合并,扩大了党派基础。在去殖民化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的理想驱动下,奉行世俗意识形态的复兴党认可伊斯兰传统对塑造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成功实现了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的联合,最大程度地团结了社会精英阶层。1954年,复兴党成立民族领导机构(National Command),管理党派设立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同年,复兴党成为叙利亚议会第二大党,并赢得两个内阁席位。^④1955年,经过对军队中实力相当的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清洗,^⑤复兴党逐渐成为军队中最有实力的党派。

在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阵营的斗争中,叙利亚与埃及签订协议,拟通过合并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并保持中立。1958年,埃叙两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⑥合并后,纳赛尔废除埃及国内所有党派,成立非党派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并要求解散包括复兴党在内的所有叙利亚政党。时任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的复兴党创始人比塔尔^⑦以及复兴党另外两位领

^① Nikolau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th Party*, p. 15.

^②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pp. 153-155.

^③ 阿拉伯社会党,又称“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Arab Socialist Movement)。该党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以哈马为中心,倡导革新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外来侵略,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④ 比塔尔当选为外交部长,哈利勒·卡拉斯(Khalil Kallas)为经济部长。参见 Alan George, *Syria: Neither Bread nor Freedom*, London: Zed Books, 2003, p. 66.

^⑤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Syrian Social National Party)是亲西方、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党派,在军队中与复兴党势均力敌。1955年,复兴党高级将领阿德南·马勒基(Adnan al-Malki)将军遭该党成员暗杀,复兴党借机对其进行清洗。

^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是1958年2月1日由埃及与叙利亚共同建成的泛阿拉伯国家。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退出,阿联解体。

^⑦ 1956年至1958年,比塔尔担任叙利亚外交部部长。1963年至1966年复兴党执政初期,比塔尔曾长期担任叙利亚总理一职。1966年,少壮派进行党内清洗,比塔尔逃亡黎巴嫩贝鲁特,后移居至法国巴黎,1980年在巴黎被暗杀。

领导人阿弗拉克和胡拉尼通过了解散复兴党的决定。^① 这一决定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初期无疑是一种政治自裁,复兴党由此遭遇了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分裂。^②

叙埃联合后不久,纳赛尔就借机剥夺了叙利亚复兴党的党政职务,埃及实际上单方面控制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有事务,导致 1961 年 9 月 28 日叙利亚再度发生军事政变,结束了叙埃合并的政治计划。

此次军事政变受到叙利亚地主阶层、资产阶级和军官的广泛支持,增加了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复兴党获得多数席位。然而,代表旧精英阶层的纳齐姆·库德西(Nazim al-Kudsi)^③上台执政后,大幅调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推行的政策,如终止国有化措施、废止正在进行中的农业改革等,引发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962 年夏,复兴党人和纳赛尔主义者等左派在阿勒颇、霍姆斯和代尔祖尔发起暴动,被当权者残酷镇压。同年,叙利亚再度发生军事政变,复兴党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分歧和摇摆。比塔尔在签署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声明后不久,宣布撤回其声明;复兴党精神领袖阿弗拉克虽仍领导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但他一方面支持重建复兴党,另一方面又希望叙利亚与埃及再度联合。1962 年被开除党籍后,胡拉尼及其支持者重新组建阿拉伯社会党,并加入由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组建的“分裂”(infisali)内阁,脱离了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运动。

二、叙利亚复兴党的重生与矛盾

1962 年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代表大会第五届会议(以下称“民族五大”)在黎巴嫩召开。会议决定在叙利亚重建复兴党,并任命临时“地区领导机构”(Regional Command)。^④ 1963 年 3 月 8 日,军队下级军官组成的少壮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叙利亚的国家政权。此次政变是叙复兴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也是“叙利亚政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分水岭”^⑤,对此后复兴党政权的权力结构演变具有决定性意

^① Elie Podeh, *The Decline of Arab Unit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New York: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9, p. 219.

^②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第 135 页。

^③ 纳齐姆·库德西是阿勒颇城市贵族阶层的代表,曾任叙利亚民族阵线政府议员,因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将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时抗议叙民族阵线政府采取的妥协政策而退出民族阵线政府,后组建叙利亚人民党(People's Party)。

^④ Avraham Ben-Tzur, "The Neo-Ba'ath Par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 No. 3, July 1968, p. 163.

^⑤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58 页。

义。1963年10月复兴党第六届全国会议标志着激进少壮派在党内的兴起。^①

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地方主义和新的思想体系是复兴党得以重建的重要条件,但这些因素也为日后的政治分歧和社会矛盾埋下了隐患。

首先,军事委员会成为复兴党掌握政权的平台,但也成为军人干政的捷径。

叙利亚建国之初,政权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城市贵族,即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城市的逊尼派精英掌握,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和基督徒中产阶级等少数派^②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以外。1963年军事政变后,一群年轻、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为争取自身权益组建军事委员会。这些下级军官大多来自叙利亚乡村等边缘地带,他们发起在叙利亚重建复兴党的运动,并很快获得了对军队的主导权。

军事委员会中的复兴党领导人意识到,军队中复兴党军官只占少数,他们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严峻挑战和威胁,因此,军事委员会成员都极力通过培植亲信或利用在军队中的特权拉拢支持者。1963年至1965年间,阿拉维派军官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曾担任复兴党人事部部长,控制着复兴党地方领导机构,培植其亲信。1966年,贾迪德与哈菲兹·阿萨德等人再次发动政变,夺取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和地区领导机构领导权。^③复兴党元老派被推翻,党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见下表)。

叙利亚复兴党地方领导机构成员的宗教派别分布(1963~1978年)

时间	1963年9月至 1966年2月		1966年3月至 1970年11月		1970年11月至 1978年11月		1963年9月至 1978年11月	
地区领导人 人数	1~4人		5~8人		9~11人		1~11人	
教派	百分比 (%)	人数 (人)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逊尼派	54.0	27	51.6	33	69.6	39	58.2	99
阿拉维派	14.0	7	23.4	15	21.4	12	20.0	34
德鲁兹派	20.0	10	9.4	6	3.6	2	10.6	18
伊斯玛仪派	10.0	5	9.4	6	0	0	6.5	11
基督教徒	2.0	1	6.3	4	5.4	3	4.7	8
合计	100	50	100	64	100	56	100	170

资料来源: Nikolau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Table 5, p. 85。

① 不同于复兴党元老派的政策,复兴党少壮派积极推行国有化等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参见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第328页。

② 多数与少数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相关文件中并得到迅速推广。本杰明·怀特认为,所谓逊尼派多数在语言(包括方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共同点并不能使其构成整体的多数,只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两个因素结合时,多数的概念才被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同时出现相对的少数概念。参见 Benjamin Thomas White,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Introduction, p. 2。

③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第135页。

1963 年至 1978 年间,叙利亚复兴党地区领导层的少数民族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在贾迪德执政的 1966 年至 1970 年间,阿拉维派党员比例高达 23.4%。通过人事结构安排,军事委员会夺得了军队中的关键职位,甚至对文官机构的日常管理、国家机器及政党自身运作进行干涉。1966 年军事政变后,叙统治精英更趋于同质化。军官阶层依托军事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执掌政权成为叙利亚政治的典型特征。

军人干政给叙利亚政治和社会带来了隐患。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当权者很少受过高等教育,却利用强制性权力对军队和国家管理机构人员进行清洗,压制逊尼派的优势地位成为当权者维持权力的惯用手段。仅 1964 年 3 月 3 日,贾迪德政府就突然宣布辞退 104 名逊尼派高级军官。^① 军人干政同时引发严重的党内斗争和社会矛盾,阻碍了国家政策的推行。复兴党在伊拉克政变成功后,民族领导机构的叙伊合并计划就因内部出现元老派阿弗拉克、伊拉克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将军 (General Ahmed Hassan al-Bakr) 和少壮派内斗而搁置;贝克尔和萨达姆叔侄领导的复兴党伊拉克地区党部支持元老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对阿萨德家族,直接导致哈菲兹·阿萨德在 1990 年海湾战争中选择支持美国;在叙利亚复兴党内部,阿萨德通过发动“纠正运动”(Corrective Revolution) 推翻并囚禁了同为阿拉维派军事强人的贾迪德,建立了自己的统治集团,而贾迪德的支持者则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复兴党。^②

在社会治理方面,复兴党政权追求社会公正,但其片面提高社会底层民众所谓的公正待遇,改变了叙利亚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复兴党政权建立后,来自乡村的当权派亲信——包括大量底层逊尼派,更多的则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取代城市精英获得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其统治也因未能实行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而广受诟病。如贾迪德掌权后,就曾采用激进的统治政策,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消灭封建势力和买办大资本,意图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对外拒绝与约旦、伊拉克和沙特等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合作,并积极援助巴解组织^③对抗约旦王室。

其次,地方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保存了复兴党的实力,但也打破了叙利亚掌权派的权力平衡。

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做出解散复兴党的决定时,并未通过其分支及普通党员的认可,从而使复兴党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但这一决定切断了地方复兴党组织与中

① John McHugo, *Syria: A Recent History*, p. 148.

② 在当前叙利亚内战中,该党加入叙利亚反对派在叙北部阿夫林、科巴尼、杰济拉和沙赫巴四个州组成的北叙利亚—罗贾瓦联邦,挑战阿萨德政权。

③ 全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4 年 10 月被第 7 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国。

央的联系。1962年,“民族五大”决定在叙利亚重新开始党派活动时,“临时地区领导机构”的大部分成员早已不是来自大马士革和哈马的骨干党员,因为他们已经转向纳赛尔主义或者分裂主义阵营了。此次会议中,哈马分支的重要领导人胡拉尼被驱逐出党。新的地方领导层只能依赖级别较低的党派成员。此外,新组建的地方领导机构要求革新党组织,他们提出叙利亚复兴党应该在更加独立和严格的框架内发展,不应该受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权威阶层的支配,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制定政策的影响因素。在叙北部拉塔基亚地区,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军事委员会组织。

1963年,复兴党相继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伊拉克与叙利亚两国政权。复兴党领导层中的元老派都忙于叙利亚—埃及—伊拉克之间联合的谈判。部分极具竞争力的高层领导集中精力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党派的组织职能落入了地方主义者和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清除了一批政见不合的个人和党派分支,将元老派排挤出各级复兴党支部,并大量吸收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成员。其结果是,党派内部各分支和各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权力中心开始向北部,特别是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集中的拉塔基亚地区转移,此后大多数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均来自这一地区。^①

阿拉维派从偏居一隅的落后群体成长为叙利亚国家的执政者,标志着复兴党地方组织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根本上改变了叙利亚政治力量的平衡。阿拉维派主要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山区,与外界隔绝,是叙利亚的宗教少数群体。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上层家庭,特别是城市中的逊尼派家庭普遍拥有阿拉维派侍女^②,反映了阿拉维派地区极度贫困与地位普遍低下的现实。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拔少数族群,很多阿拉维派青年应征入伍,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其中贾迪德和阿萨德先后掌握了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权。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代表阿拉维派登上了国家权力顶峰。上台后的阿萨德积极扩大其政权基础,对外重新与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对内则向本国资本家做出巨大让步,放宽国外投资限制,使叙利亚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③叙利亚骤然间被推向了阿拉伯世界舞台的中心,阿萨德的个人影响力也超越了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整体地位,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铁腕人物。^④

为了争取大众支持,新复兴党宣称反对旧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宣扬阿拉伯社会

^① 1965年第二次地区会议的报告回顾了自1962年之后复兴党的发展,但并未发表。据1966年发行的系列文件披露,拉塔基亚分支会员数远超其他分支;此外,该党还存在大量取消前党员资格,以不公正的手段吸纳新成员的现象。

^② Mahmud A. Faksh, “The Alawi Community of Syria: A New Dominant Political Forc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2, April 1984, pp. 133-153.

^③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3页。

^④ 王新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第135页。

主义。但事实上,复兴党地方主义者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1963 年他们曾联合马克思主义者与老一代领导层进行斗争;1964 年他们又与右翼势力一同反对左派;1965 年他们再次启用被废除的左派口号,号召反对旧的民族领导机构;1966 年初,他们倒向军队多数派发动的政变。叙利亚地方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使其能够在叙利亚民族领导机构和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力量失败后,仍然在叙利亚复兴党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思想体系的更替暂时维系了复兴党的精神统一,但“社会主义”和“阿拉伯主义”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

叙利亚复兴党坚持伊斯兰教、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但当殖民主义影响消退、复兴党政权面临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重挑战时,泛阿拉伯主义这一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分歧。在泛阿拉伯主义指导下的一系列联盟计划的失败,彻底摧毁了复兴党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传统的政治信条,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混乱。在复兴党内部,不论是旧的党派领导、军事集团,还是地方主义者或野心家,都未能提出广泛适用的思想体系来解决来自党派内部、阿拉伯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

1963 年 2 月,叙利亚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辛·哈菲兹(Yassin al-Hafiz)撰文批判复兴党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原则,认为其关于自由的定义不明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由意味着在议会制与军事政变和独裁之间摇摆。在叙利亚这样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权将导致封建—资产阶级占支配性地位并进行反动统治,如果不约束少部分富人的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社会改革以保证大众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军事政变或独裁统治是“自上而下”改革的捷径,但最终将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军事官僚阶层”。哈菲兹进一步提出,为保证大众的自由,应限制反动阶级的自由,赋予劳动人民完全的自由,阻止军队干预政治。^①同时,哈菲兹提出“通往社会主义的阿拉伯道路”(Arab way to Socialism),即采用科学方法、现实路径解决叙利亚国家和阿拉伯统一的问题,强调复兴党的社会基础应该来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而非军队和小资产阶级。叙利亚军事集团很快接受了哈菲兹对自由的批判理论,并借助这一理论反对叙利亚的议会民主制。对于叙利亚军事集团而言,这些理论和思想有助于其实行威权统治、反对议会民主、限制个体自由,但并未接受“军队不能干涉政治活动”的思想。

在第六届阿拉伯民族领导机构会议中,左派关于思想体系建设的意见成为新复兴党的信条。然而,叙利亚军事集团制定的党派指导思想只是在表面上同马克思主

^① Itamar Rabinovich, *Syria Under the Bath, 1963-66: The Army Party Symbiosi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2, p. 41.

义一致,它们仍存在诸多分歧:其一,虽然接受“通往社会主义的阿拉伯道路”作为发展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叙利亚复兴党并未抛弃“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的提法。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不同,但不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其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基础”的理论,在实践中,阶级斗争被复兴党用来解释其极端民族主义政策,针对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等非阿拉伯民族。^①其三,当权者完全忽视哈菲兹关于军队干政危险性的警告,并最终建立起党军合一的管理体制。

叙利亚复兴党作为一个公认的具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现代民族主义政党,^②掌握叙利亚国家政权至今,体现了其先进性。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多次军事政变都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如统治阶层内部复兴党与逊尼派旧精英之间、复兴党与纳赛尔主义者之间、复兴党内部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叙利亚复兴党沦为以军队为首的官僚机器的变体,是僵化的军队体制的产物。在老阿萨德总统的威权统治下,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作用和地位急剧下降。

三、复兴党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二战后,现代叙利亚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并获得独立,但叙国内和外部始终存在动荡因素。^③老阿萨德总统利用政治手腕,平息了国内的数次起义,通过控制复兴党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影响着地区政治风云,塑造了强硬的叙利亚国家形象,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叙利亚内战。

通过支持老阿萨德总统的儿子为法定继承人,复兴党表现出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的能力。老阿萨德军人管党的政治权威如同他在世时一样有效。在公布老阿萨德总统死讯的当天,叙利亚议会修改宪法,降低总统候选人合法年龄;安全部队关闭机场,封锁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以控制反对派进入叙利亚干扰修宪进程。在此后几周内,复兴党政治精英将阿萨德之子巴沙尔·阿萨德置于统治机构的最顶端。叙利亚面临从共和制向世袭制的转变。埃及学者萨阿德·易卜拉欣(Sa'ad Ibrahim)

^① Avraham Ben-Tzur, "The Neo-Ba'ath Party," p. 174.

^② 王新刚:《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53-158页。

^③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叙利亚经历了15次军事政变,3次中东战争以及与地区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1976年至1984年叙利亚曾濒临内战。参见 James T. Quinlivan, "Coup-proofing: Its Practice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 134; Raymond Hinnebusch,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athist Syr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 281-286, 291-299; Steven Heydemann, *Authoritarianism in Syria: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1946-197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22。

曾创造出“*Jumalikaya*”这个术语,即阿拉伯语“共和制”与“君主政体”的结合来描述这一事件,^①但这一术语只能部分解释叙利亚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即政党和军队等国家机构无法限制叙利亚总统的行为。叙利亚政权得以顺利交接体现了复兴党对老阿萨德政权的忠诚与支持,也表现出叙利亚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权力平衡,为避免内部的权力争夺危害政权的生存,他们在国家领导人继承者的选举中达成了一致。^②

在复兴党政治框架内,老阿萨德总统依靠强大的军事派系和可靠的安全机构维持统治,同时也遗留下军人管党、威权主义等诸多颇受争议的政治遗产。以色列学者埃亚尔·齐塞尔(Eyal Zisser)认为,在老阿萨德统治的最后十年,叙利亚已经陷入绝境,面临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权的继承、社会经济危机、全球化冲击、黎巴嫩动荡、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等。^③总之,阿萨德给儿子巴沙尔留下了一个处于全面衰退的国家。

老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面临新形势下叙利亚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双重挑战。执政初期,巴沙尔在政治上推行有限的民主化,他宣布进行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赋予人民议会更多权力、释放政治犯、推进反腐败运动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有限的政治自由化改革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④然而,由于各类政治活动及言论逐渐超越了政府容忍的底线,巴沙尔政府察觉到叙利亚国内局势面临失控的风险,便逐渐放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推行的改革计划,开始收紧权力,并采取措施压制叙利亚公民社会意识的觉醒。2001年9月叙利亚政府逮捕了大量社会活动家,昙花一现的“大马士革之春”随即终结。^⑤虽然此后巴沙尔将叙利亚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政治、社会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但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摇摆。巴沙尔政府经济上的改革由于受到政治约束,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无力革除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利益集团与精英阶层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带来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矛盾的激化。巴沙尔政府不仅面对国内反对派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而且面临来自反对派武装力量的挑战。

在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与战乱中,叙利亚国内政局不稳、经济萧条、社会动乱、难

① Sa'ad Eddin Ibrahim, "How I Spent My Summer Vacation: Diary of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Lecture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Egypt, September 2000, 转引自 Stacey E. Pollard,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Doctor Dissertation,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2014, pp. 33-34。

② Joshua Stacher, "Reinterpreting Authoritarian Power: Syria's Hereditary Success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5, No. 2, 2011, pp. 197-212。

③ Eyal Zisser, "Will Bashshar al-Asad L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7, No. 3, 2000, p. 10。

④ 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第394页。

⑤ 王新刚,张文涛:《叙利亚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研究》,载《外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51-66页。

民问题严峻,俨然进入了“叙利亚之冬”。为应对社会动荡,巴沙尔的西方教育背景^①使其采用激进手段进行民主化改革,并急于释放大批政治反对派和极端组织头目来缓和社会矛盾,包括后来两个最大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对派武装“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和“沙姆自由人”(Ahrar al-Sham)的创始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和地区的动荡。^②巴沙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的判断失误,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叙利亚的动荡局势。2011年巴沙尔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叙利亚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但叙利亚人民不会起义。这不仅仅是关于需求或者改革,这是有关人们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为之奋斗的事业。”^③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巴沙尔缺乏政治经验,导致其对叙利亚社会矛盾的认识过于理想化。

复兴党演变过程中遗留的社会分化和教派、地区冲突等问题在当前叙利亚政治生态中的映射,增加了叙利亚内战的复杂性。

首先,复兴党有关安全和阶级的观点已经过时,不符合当前政治发展形势。

叙利亚著名政治思想家米切尔·基洛(Michel Kilo)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叙利亚社会实现了巨大发展,社会结构先进且文明,但其政治体制始终处于静止状态。^④在军事政变频发的叙利亚,维护政权安全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复兴党有关安全和阶级的决策主要为威权政治秩序服务,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稳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在推动欠发达国家政治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叙利亚当权者将中产阶级排除在政治框架之外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持续性。^⑤当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体与当局发生矛盾时,便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此外,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更使得安全问题成为叙利亚压倒一切的首要考虑。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当权者以旧有思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实际上,最初走上叙利亚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的民众不过几千人,而且主要来自叙利亚南部省份德拉(Dara'a)等偏远地区。^⑥

^① 有西方学者质疑巴沙尔短暂的西方留学生活是否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认为其政治观点更多来源于在叙利亚的成长和政治经历。参见 Nikolaos Van Dam, *Destroying a Nation: The Civil War in Syria*, pp. 84-86; David W. Lesch, *Syria: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Assa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2.

^② 有西方学者认为,巴沙尔政权有意增加叙利亚动荡因素以显示其统治效力。参见 John McHugo, *Syria: A Recent History*, pp. 227-228.

^③ Eyal Zisser, "The Struggle for Syria: Return to the Pas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7, No. 1, 2012, pp. 105-110.

^④ Michel Kilo, "Syria... the Road to Where,"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4, No. 4, 2011, pp. 431-444.

^⑤ 复兴党曾依靠具有农村和宗教少数派背景的新兴中产阶级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当该群体所代表的阶层地位逐渐稳固时,复兴党遂开始压制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新的中产阶级。参见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第328页。

^⑥ 德拉省曾经是复兴党最主要的支持力量的分布地区及其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地。

其次,民众对于阿弗拉克自由理想的质疑仍在继续。

在复兴党的三点原则中,阿弗拉克认为“自由”应该包含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个人自由即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艺术自由。^① 在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期间,叙利亚年轻人要求当权者倾听其声音、满足其要求,他们希望将网络领域的个体自由追求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然而,叙利亚当局利用政治特权,不断地制造政治“紧身衣”,引起叙利亚年轻人的强烈不满。^② 此外,民众提出“建立以自由、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建立分权制的公民国家,享有民主、社会公正和平等”^③等诉求,不断冲击着复兴党倡导的政治理想,而复兴党未能将理想成功转化成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进行政权改革的手段和机制。当权者刻意压制社会力量及其在文化、政治领域的自由,导致其诉求最终以公开反对政府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场争取自由的运动背后,是受阿拉维派复兴党政权压制的复兴党内部竞争对手、旧的逊尼派城市精英以及在社会分化中未能分享权益的阶层常年积累的权利诉求的集中爆发。

最后,党内精英阶层的集中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制约了政治结构的动态变化。

虽然大多数复兴党领导人最初对复兴党意识形态的设想非常理想化,希望最终消灭一切教派和地域分歧,但在叙利亚社会政治现实中,教派、地区、部落和家族联系仍是叙利亚当权者维持其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④ 阿拉维派确立了在复兴党统治集团的绝对主导地位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每一批叙利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阿拉维派都占据 80%~85%。^⑤ 至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军队指挥官绝大多数由阿拉维派担任,而国家军事、情报、安全部门全部由阿萨德家族成员掌控。为保证权力结构中教派、地区、部落等群体的既得利益,叙利亚当权者将整个社会纳入其内部权力的分化模式中,从而抑制中产阶级的流动性,避免其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叙利亚政治结构的核心成为不断更新的利益集团,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这种结构类似于倒置的漏斗,统治阶层不断从社会里吸纳它需要的成员,通过与他们分享有限的权力将其纳入自己的结构中,代价是他们必须割断之前的一切社会关系。^⑥ 而少数族群,特别是阿拉维派只能充当当权者的

①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p. 154.

② Michel Kilo, "Syria... the Road to Where," p. 434.

③ Ibid., p. 435.

④ Nikolaos Van Dam, *Destroying a Nation: The Civil War in Syria*, p. 60.

⑤ Hicham Bou Nassif, "Second-Class: The Grievances of Sunni Officers in the Syrian Armed Forc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8, No. 5, 2015, pp. 626-649.

⑥ Michel Kilo, "Syria... the Road to Where," p. 433.

先锋或者阶级同盟。^① 当他们确立了社会优势地位,并很快与城市精英形成利益联盟之后,便逐渐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沙尔政府并不完全代表阿拉维派的权益。叙利亚内战期间,该国出现了逾 1,500 个反对派组织,其中主导军事反对派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甚至宗教极端势力在名义上都是由激进的逊尼派组成的、反阿拉维政权的力量。^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派分歧能充分解释叙利亚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斗争。叙利亚阿拉维派内部也存在反对阿萨德统治的势力,同样因政治或安全问题遭当局迫害。^③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统治与宗教反对派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宗教极端势力背后社会问题的实质,即利益集团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导致的利益与权力的分配不公。

四、结 语

在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叙利亚复兴党经过与国内乃至阿拉伯世界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持续至今。2011 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给叙利亚社会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叙利亚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来重建家园。事实上,在当下的中东国家,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告别贫困比告别权威更重要。^④ 这场危机深刻地体现出叙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作为执政党的叙利亚复兴党经历了多次政治跌宕,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在内战中凸显,如缺乏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组织机能、执政理念未能与时俱进、无法形成对当权者的有效约束等。叙利亚复兴党亟需加强自身建设以积蓄力量,从而重新握紧国家的治理大权。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Raymond H. Hinnebusch, "Class and State in Ba'athist Syria," in Richard T. Antoun and Donald Quataert, eds., *Syri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 46-47.

^② Raymond H. Hinnebusch, "Class and State in Ba'athist Syria," in Richard T. Antoun and Donald Quataert, eds., *Syri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13.

^③ Nikolaos Van Dam, *Destroying a Nation: The Civil War in Syria*, p. 69.

^④ 王泰:《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78-84 页。